

舌战中国

21 世纪属于中国吗？

[美] 亨利·基辛格 [中] 李稻葵 著
[美] 尼尔·弗格森 [美] 法里德·扎卡利亚
蒋宗强 译

Does the 21st
Century Belong to
China?



中信出版社 · CHINACITICPRESS

舌战中国

21 世纪属于中国吗？

[美] 亨利·基辛格 [中] 李稻葵 合著
[美] 尼尔·弗格森 [美] 埃里德·扎卡利亚

蒋宗强 译

Does the 21st
Century Belong to
China?

中信出版社 · CHINACITICPRESS · 北京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舌战中国: 21 世纪属于中国吗? / (美) 基辛格等著; 蒋宗强译. —北京: 中信出版社, 2012.10

书名原文: Does the 21st Century Belong to China? .

ISBN 978-7-5086-3410-4

I. 舌… II. ①基… ②蒋… III. 中外关系—研究 IV.D82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2) 第 217849 号

DOES THE 21ST CENTURY BELONG TO CHINA?: THE MUNK DEBATE ON CHINA by Niall Ferguson, DR. Henry Kissinger,

David Daokui Li, Fareed Zakaria

Copyright © 2011 Aurea Foundation

Henry Kissinger interview copyright © 2011 John Geiger

David Li interview copyright © 2011 John Geiger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edition © 2012 by China CITIC Press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HOUSE OF ANANSI PRESS INC. through BIG APPLE AGENCY, INC., LABUAN, MALAYSIA.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书仅限于中国大陆地区发行销售

舌战中国: 21 世纪属于中国吗?

著 者: [美]亨利·基辛格 [中]李稻葵 [美]尼尔·弗格森 [美]法里德·扎卡利亚

译 者: 蒋宗强

策划推广: 中信出版社 (China CITIC Press)

出版发行: 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甲 4 号富盛大厦 2 座 邮编 100029)

(CITIC Publishing Group)

承 印 者: 北京画中画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mm×1230mm 1/32

印 张: 7 字 数: 90 千字

版 次: 2012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2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京权图字: 01-2012-2125

广告经营许可证: 京朝工商广字第 8087 号

书 号: ISBN 978-7-5086-3410-4/D·244

定 价: 39.00 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本社图书, 如有缺页、倒页、脱页, 由发行公司负责退换。

服务热线: 010-84849555 服务传真: 010-84849000

投稿邮箱: author@citicpub.com

西方知识界发出的挑战

2011年6月17日，加拿大最大的音乐厅、位于多伦多的能容纳2 600人的罗伊·汤姆森音乐厅座无虚席，加拿大电视台实况转播。事实上，一个多月前，票在上市后的几天内即销售一空，创下了该音乐厅的纪录。这不是一场流行乐的演唱会，不是世界顶尖交响乐团的音乐会，也不是宗教礼拜活动，而是一场辩论会。辩论的主题就是21世纪是不是中国的世纪。

作为一个来自于中国的学者，我是辩论会的四个主角

之一。我站在舞台上，感到阵阵目眩。这也许是我这个学者这辈子见到过的最大的场面了。我的的确确地被明星了一把。在辩论会的前后几天中，我体验到了Lady Gaga、麦当娜、郎朗的待遇：头等舱从北京飞往多伦多、专门接送歌星和体育明星的超大型SUV把我从机场接到了酒店，加长的林肯又把我从酒店接到了多伦多大学，与他们的公共研究方向的教授们座谈，下午又被送到了汤姆森音乐厅为明星专门准备的单人化妆间，各种酒水、专业的化妆师一一配齐。的确，这是一个集娱乐、学术与公共活动于一身的大活动，这种活动也只能发生在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极其发达的加拿大，而话题就是中国。作为一个中国土生土长的学者，在西方受过多年的教育，对这种场面我心知肚明，这绝对不是我个人的能力、造诣所带来的，这完全是13亿人口的中国在30多年改革开放的进程中不断前进而引发的世人对中国经济的关注。这是一场游戏，更是一个没有硝烟的战场。

我的学术生涯最大的挑战

半年前我收到芒克辩论会邀请时，我的心情是非常矛

盾的。出于学者的本性，我是非常不愿意抛头露面的，尤其是在异国他乡抛头露面。而且，辩论的话题如此之大，远远超过任何一个学者专业研究的范畴，我相信全世界都极少有人能够把这一宏观问题讲清楚。但是我在仔细分析后也感受到责任之重大，面对这样的邀请，如果我们这批根植于中国又有幸比较系统地学习西方社会科学的、有一定与西方人沟通的能力的学者不能挺身而出，那么对于这种重大话题的诠释权毫无疑问将会拱手让给西方媒体和知识界，我相信这样一个结果对于我们而言都是不能接受的。因此，芒克辩论会与其说是个人荣耀的体现，不如说是严峻的挑战。这种挑战实际上是多重的，挑战的第一个方面是要对这个话题有比较全面、力图深刻的认识，对于这一重大话题，学者们在学术研究领域是避免的，话题如此宏大，以至于任何学者都不可能、也不愿意把自己的研究框定在这一范围内，任何严肃的学术研究都不可能取得进展。

挑战的第二个方面是如何向西方人传递一个清晰的信号，尤其是不能让西方人认为中国的崛起和复兴是一场灾难，而彻底打消西方人的忧虑。挑战的第三个方面是要明确且清晰地传达自己的理念，让我十分担忧的是，跟我一起辩论的对手是国际政治界和学术界长期仰望的亨利·基

辛格博士，也有来自哈佛大学的年轻的历史学家尼尔·弗格森，以及美国CNN的著名主持人、《时代》杂志的主编法里德·扎卡利亚。在一个西方的国度，用西方人的语言，与西方最顶尖的政治家、学者、媒体精英一起辩论中国的话题，这毫无疑问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半年多过去了，回首2011年6月17日的芒克辩论会，我感到无限欣慰。这场辩论会经过精心准备，以及朋友们的支持，我想辩论会是圆满的。这场辩论会的结果也是我事先最期望的，那就是作为辩论会的正方，输掉这场辩论会，但在内容上要赢得观众们的心。

为什么要辩论“21世纪是否属于中国”

芒克辩论会是一个极具社会影响力的、由加拿大巨富芒克本人创办的辩论会。它为什么要在2011年选择“21世纪是否属于中国”作为它的辩论话题？这一问题本身太值得我们深思。

我看，首先要从西方社会自身找答案。金融危机爆发三年以来，它对西方社会以及社会根本性的冲击才刚刚体现，西方精英阶层的自信心在大幅下降。当今，西方思想

界和政治界都处于混沌状态。我们看到整个西方世界除了德语区以及与中国经济互补性较强的经济体（加拿大、澳大利亚），都陷入了深重的国家信用危机泥潭。

在这样的背景下，西方社会客观上讲需要一代像撒切尔夫人和里根总统那样的政治领袖，推进大刀阔斧的改革，而现在却没有任何迹象表明这样的领袖会应运而生。更重要的是，在政治领袖出现之前需要一批学者思想开道，奔走呼号，提出一系列指向性非常强、思路非常清晰的改革路线图，这一点现在也不清晰。在西方，我们看不到任何具有凝聚力的思想家提出新的社会共识，指出改革的方向。

因此，在可预见的未来，西方发达国家仍将陷入债务危机、财政危机的泥潭之中。在这一过程中，西方的国家信用还将进一步下降，民众对政府的不满还将不断地膨胀，而整个西方社会的精英对他们本身的政治体制、经济体制的绝对优越性一定会产生怀疑。这种不自信的情绪在逐渐蔓延。

西方知识界的自我怀疑造就了充斥于报刊、电视节目和互联网上的激烈讨论和争辩：500年来西方征服世界的历史已经结束了吗？谁是后起者？中国是这种征服游戏的下一个盟主吗？芒克辩论会作为西方世界一流的高端辩论会，

把“21 世纪是否属于中国”作为辩题，请来当代国际关系的理论大师和实践者基辛格，请来西方知识界最叫座的名嘴、CNN 电视节目主持人扎卡利亚，哈佛大学历史学家弗格森，这当然非常好理解了。至于我，我始终认为那是个巧合，我只不过是在特殊的时刻、特殊的话题上碰巧出现了。

一场我迫切希望输掉的战斗

我想我们每一位社会科学的研究者事实上都是社会变迁的一分子。我们与自然科学家不同，我们的每一个言论事实上都在以各种方式影响社会的变迁。因此，在一定的场合下，我们不得不“违心地”表达个人观点。基辛格在他的新书《论中国》出版之后，接受了各主流媒体的专访，他每次都非常委婉地表达这一层意思。

我们必须认识到，一个不自信的西方是中国不愿意看到的西方，是中国很难与之正常交往、合作发展的西方。一个不自信的西方不可能客观地面对中国的崛起，他们对中国的猜疑之心会日益加深。中国崛起的进程远远没有结束，中国的制度变迁必须推进，中国的对外开放必须坚持，这一切都有赖于我们解决一个重大课题，那就是要不断地

用一种开放的、友善的、客观的态度化解西方对中国各种各样的猜疑，只有这样，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才能比较顺利地完成。

我想芒克辩论会中心情最纠结的辩手就是基辛格博士和我，我们两个人被分配在了辩论的正反两方，但本质上讲我们都不希望观众得出过于简单的结论。因此，我们所传达出的信息与自己的真实想法是有差距的。基辛格博士在他的新书中、媒体采访中都反复强调：他不希望西方的读者们得出中国将会统治世界的结论，他也不希望中国的政治家们得出“中国没戏”的结论。他真实的目的是想让中国与西方都认识到彼此的重要性，认识到维系正常的合作关系的重要性。因此，基辛格在辩论会前说，他参加这场辩论会的前提是他要站到反方，即“21 世纪不属于中国”，但是他又不希望中国的朋友们把他的观点误解为中国没有希望、中国没戏。因此，他的立场是比较复杂的。

而我的处境与基辛格非常类似，但是基本立场是相反的。从内心上讲，我是认为中国是有可能在 21 世纪实现全面复兴梦想的，21 世纪全世界各国中影响力上升最快的国家也许是中国。在这个意义上，21 世纪是有可能属于中国的；但我担心的是西方观众把这种进步快、影响力上升理

解为“霸权”，把21世纪属于中国这一命题等价于中国将成为21世纪的超级大国，从而打破西方的发展美梦。因此，我精心准备，力图精确地传达出自己的真实想法，但是又希望这个想法使观众们得出一个结论，那就是中国将不会称霸世界，将不会阻碍世界其他发达国家的发展，也就是说，我真心希望这场辩论的结果是我方失败，从结果上看，我的目标达到了：辩论会结束时，观众们当场投票，结果是多数人不认为21世纪属于中国，而且持此观点者比辩论开场前还多。

实质性的问题：21世纪，中国如何持续进步

芒克辩论会事实上给每一位根植于中国社会科学的研究者提出了一个必须面对中国民众回答的好问题：21世纪有可能属于中国吗？如果有可能，可能性一定来自于中国办好自己的事情，从而使中国在21世纪有长足的进步，这是我们最应该也必须讨论的话题。

21世纪初，世界格局正在发生重大的变化，国际金融、经济和政治格局乌云密布、乱象丛生，世界处在一个名副其实的乱世之中，在这种环境下，我想绝大部分民众都同

意一个观点，那就是如果中国能够办好自己的事情，站稳脚跟，那么中国将会逐步成为世界上重要的、有影响力的国家，中国的国际地位将会逐步恢复到它在几百年前的国际地位，那么中国需要在哪些方面做出努力呢？基于我若干年来的一些不成熟的思考，我认为中国在以下四个方面的努力是必不可少的，这也是我们国人应该共同努力的方向。

持续进步的必要条件：经济体制改革需要不断前进

经过了 30 多年的改革，今天的中国经济已经初步呈现出现代市场经济的基本框架，但是必须看到，中国经济今天的体制与发达的现代市场经济体制相去甚远，在很多重大方面改革远远不到位，甚至中国需要什么样的市场经济体制这一认识还极其不足。

现代市场经济涉及一系列非常复杂的制度安排，而这些制度安排在不同国家有不同的特点，至少现代市场经济的制度安排有三个重要的维度需要认真把握。

第一个基本维度是生产与交换的具体制度安排。在这方面，中国的市场经济转型还远未完成，其中非常核心的

是生产的制度安排，我们过去简单地认为，只要产权和所有制明晰的制度安排就比较合理了，但这种认识恐怕是远远不够的，今天我们看到，全球的生产领域的制度安排既有像美国式资本市场运行加大股东式的生产企业的制度安排，也有韩国式的家族控制的企业加财团的制度安排，更有像德国式的族与政府共同影响的制度安排，今天我们社会上激烈争论的“国进民退”还是“民进国退”等问题，本质上就涉及我们到底需要什么样的制度安排。而这种未来的生产型的制度安排改革，需要与中国社会种种社会制度的禀赋要求相一致。由于中国社会当前对于私人产权、对于守法的家族性的运行有了一定的容忍度，对于部分的政府控制也有相当的容忍度，因此德国式的生产性制度安排特别值得我们研究。

第二个基本维度是维系市场经济平稳运行的制度安排。必须承认现代经济具有内生的基本的波动性，这种波动往往是巨大的。金融危机就是证明。为了应对内生的波动，在这方面，现代经济必须有一系列基本的制度安排。

首先是公共品的厘清与提供。必须认定什么样的产品和服务是公共品，这些产品和服务因此要由国家来提供。在这方面，不同的经济体有不同的理解。比如，至今为止，

英国与日本显然认为一些基本的新闻和媒体服务是公共品，因此英国广播公司与日本的NHK都是国家出资、政府监管，美国没有这一传统。再比如，基本住房服务在新加坡被理解为具有公共产品性质，因此由政府直接提供，在美国则更多地被理解为私人产品。

是否应该进行收入再分配？是否应该通过收入再分配缩小收入差距从而为社会提供一个基本的和谐度？不同社会对于这一问题的理解可以完全不同，因此相关的制度安排千差万别。福利制度同样是维持经济平稳运行的基本制度安排，这是20世纪初英国首先提出、在德国得到了大力推进的。一个基本的福利制度的建立，对于维系经济稳定是至关重要的。

公共财政也是维系经济平稳运行的基本性制度，这里又有许多具体的制度安排，比如，公共财政的收入基础是来自于国有企业还是来自于税收，国家要不要控制一部分盈利性资产，要不要控制一些非生产性金融资产。

此外，宏观经济的管理体制，比如央行、证监会和银监会等方面的管理，对于现代市场经济来讲也是至关重要的，在这一点上，即便最保守的自由意志者也承认。米尔顿·弗里德曼反复强调，在金融危机爆发之时，央行有天

然的职责，必须大量印钞；而且，央行需要与财政部协调，而非孑然独立。再有，维系经济运行的制度安排是市场监管，其中涉及的问题包括对相关金融机构是否要在很大程度上进行监管，对它们的资本量、风险程度是否要不断监控，甚至是征收惩罚性税收等。

第三个基本维度是利益冲突的解决和权利分配的机制。经济中的各个利益体之间不可避免地会产生利益冲突，这些冲突不可能完全通过市场的价格机制以及友好协商的途径来解决。即便罗纳德·科斯也认为，要维系市场运行，必须有一个有约束力的法庭做背景。权利分配与此密切相关，谁拥有什么样的权利决定着交易双方如何进行协商，这也是科斯反复强调的。事实上，科斯定理的要点就是强调权利分配的重要性，也就是说，只有在把权利划分清楚的情况下，同时存在公正的第三方合同执行者，市场双方才有可能进行有效的协商谈判，从而达到帕累托最优的结果。

在这方面，需要特别强调法制的作用。法制在中国有一种被神化的趋势，认为法制是万能的。这值得仔细研究。法制本身不可能在真空中运行。在现实中，两类群体是法制的占优者。一是市场上的强势群体或者说富有阶层，他们往往在法律上是占优的，因为他们可以聘请最优秀的律

师以及利用相关资源打赢官司。二是政府，他们往往是法律体制中的强者，普通民众很难告赢政府。所以，法制的正常运行必须要有一套相关的体系来维系，尤其是需要通过一定的监管来维系，比如通过政府的监管约束社会上高财富阶层影响法制的强大能力；同时，也有必要通过公众媒体等公开的方式以及政府分权的方式，约束政府在法制体系里天然的优势。

法制的另一个重大问题是谁来立法。在这个问题上，不同国家有不同的处理方式。英美体制下，立法权很大程度上是下放给法院和法官的；在欧洲大陆，立法的权力是由政府部门代表国家来实现的；中国目前的立法也基本上是由政府部门主导的。这种政府主导立法的缺陷，我们已经看到过不少。

有限权威时代，经济改革的方式需要改革

21 世纪初，中国的社会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我们已经进入了有限权威时代。在有限权威时代，政府及其决策者正式的权力并不一定减少，但是决断力和执行力却明显受限，主要原因之一是民众通过互联网以及其他媒体表达意见，形成了日益强大的舆论压力，另一个主要原因是现有

体制内部的利益多元化，导致政府决策过程受到各方利益的游说，执行过程受到各种掣肘。在有限权威时代，学者自己的权威也有限。如果说在某一问题或某一话题上学者们似乎仍然具有较大的影响力，往往是因为他们的观点附庸流行的思潮和社会舆论，形成了共鸣，而非反过来的机制。

而如何凝聚社会的共识，如何推进有意义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呢？这一问题已转换为如何识别社会上多数人的偏好，也就是说，如何识别推进社会改革的约束条件。换言之，今天讨论改革的方式应该从“我认为改革应该怎么进行”转变为“今天的社会主体需要什么样的改革，社会的基本偏好和约束条件是什么，根据这些基本偏好和约束条件，如果我们进行了ABC式的改革，未来的后果将是XYZ，而这种未来出现的XYZ的结果是否能够符合社会的基本偏好”。换言之，学者的角色在转变，从给社会开处方治病转换为给社会列菜单，帮助点菜，即通过理性的分析告诉社会公众和决策者：改革有哪些选项，每一个选项未来的结果是什么，而这些结果与今天相比，根据民众的认识，是更好还是更坏。